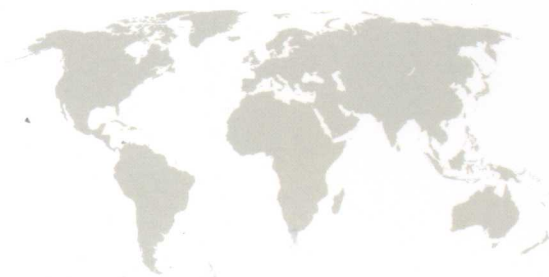


主 编 郝时远 朱 伦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Translation Series

民族学人类学译丛



Some of the early branches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such as early anthropometry, are now rejected as pseudoscience. Metrics such as the cephalic index were used to derive behavioural characteristics. Two of the earliest founders of scientific physical anthropology were Paul Broca and Franz Boas.

Nacionalismo y Territorio

民族主义与领土

[西] 胡安·诺格 / 著
徐鹤林 朱 伦 / 译

“地理可以规划但不可安排”，皮尔·比拉尔断然地说。从我读到这句话时起，我就对它的丰富内涵深信不疑。我从未放弃过这个劝告而受益匪浅。在谈及比拉尔的一篇地理学文章时，恩里克·卢斯说，即使希特勒糟蹋了政治地理学，但是政治地理学还继续存在着。胡安·诺格从地理学的这些角度但又是灵活的角度，经反复思考写下了这本书。

——埃内斯托·卢奇

(巴塞罗那大学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民族主义与领土

[西] 胡安·诺格 / 著

徐鹤林 朱 伦 / 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主义与领土/(西)胡安·诺格著;徐鹤林,朱伦译.—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1108-622-5

I. 民… II. ①胡…②徐…③朱… III. 民族主义—关系—领
土—研究 IV. D091.5 D9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537 号

民族主义与领土

- 策 划 戴佩丽
作 者 胡安·诺格
译 者 徐鹤林 朱 伦
责任编辑 华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4.125
字 数 103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622-5
定 价 1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中国的翻译历史十分久远，先秦文献有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华夏互动关系的记述，就包括了翻译的桥梁作用，即“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翻译不仅在“五方之民”及其后裔的漫长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沟通理解作用，而且也是中国认识世界、引进域外思想文化的工具，其中佛教经典的翻译可谓最大的工程。

近世“西学东渐”是中国社会步入世界现代进程中的巨大动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屈辱中开始重新认识世界，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魏源进而增修汇编的《海国图志》，开启了中国近代译介西学的先河，即所谓“中国知西政之始”。译介西学是中国仁人志士从过去视域外技艺为“奇技淫巧”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变革，而甲午之后则成为中国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之急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的推动和身体力行，使“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内容逐步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其中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也渐次介绍到中国。如1902年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1903年，林纾、魏易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德国民族学家哈伯兰的《民种学》(Ethnology)，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著作《天演论》，均属西方民

^① 《礼记》，“王制”，第五，引自《十三经注疏》。

族学、人类学著述进入中国的开山译作。

中国虽然有编写民族志的历史传统，但是作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化发展则仅有百年的历史。在推进这些源自西方的学科本土化发展进程中，译介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代表作，一直是推进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建设之一。因此，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早期开拓者和著名前辈，往往也是从译介国外民族学与人类学名著名篇开始其学术生涯，而这一治学特点也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推进学科建设、发展学术事业的自觉传统。百年来，中国学界对国外民族学与人类学著作的翻译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偏重，但是可以说从未间断，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理论流派和前沿话题，基本上为国内学界所熟悉，并在本土化运用中发挥着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的译介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的历史经典、现代新作不断为学人所译介，如1979-1994年的《民族译丛》杂志即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术翻译载体。同时，国外民族学、人类学著作的翻译也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有30多家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数以百计的民族学、人类学译著，而且近年来呈现系列性刊布的发展趋势。这些译著涉及面之广，不仅涵盖了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经典民族志，而且涉及了民族学、人类学的诸多分支学科。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在与世界互动进程中实现发展。中国的学术事业也是如此，在持续和不断深入的国际交流中走向繁荣。其中译介国际学术的最新成果，是实践学术交流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面对着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其中民族问题即是具有普遍性的领域之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重要的智力源泉。民

族问题历来与诸种社会问题渗透交叉，无论是对民族大千世界而言，还是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以及人口、宗教、语言、人权、生态、城镇化等专门话题，都是民族问题的题中之意。而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分支化发展，与其他学科的不断交融，其中必然地包括了适应民族问题普遍性、复杂性、长期性、重要性和国际性特点的意义。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民族学人类学译丛》，基本主题属于民族政治学或政治人类学范畴，突出了民族（nation）、民族主义（nationalism）、族性（ethnicity）、族群（ethnic group）理论概念的研究特点，包括了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少数人权力（minority rights）和前苏联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政治人类学导论和世界范围族群口径的分类资料，其目的是为了就国内诸多学科所关注的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少数人权力的研究和有关“族群”概念的理解、争论和应用，提供更多的学术参考。在这方面，相关译者和出版社已经推出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这套丛书将进一步就同类话题展开更广泛的学术探究，以满足国内学界不断增强的学术需求。

毫无疑问，在学术翻译中，概念体系的对应或新构历来存在着困扰。诚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曾面对近世“西学东渐”不脛而走的大量新概念所说的那样，“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系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骘骘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①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民族”、“族群”这类概念的研究、阐释和论争，也是如此。所以，在这套丛书翻译过程中，基

^①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本概念问题依然是难点，期间虽然力求统一，但是每一个译者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且直接关系到对其论理的理解。因此，在这套丛书中我们要求译者尽可能地保留一些基本概念的原文，以使读者全面准确地理解原作的意思，我想这也应该成为学术翻译的基本规范。

概念及其定义，是对相关要素、特征的概括和理论阐释的支点。因此，沃勒斯坦认为：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事实上是概念的翻译问题，因为社会科学的讨论往往以概念为核心，而概念又是经过作者自己清晰界定和应用的。概念是公诸众人的意义参照，也是资料、数据的综合描述，是对现实世界的分类。同时，由概念引起的矛盾也比比皆是^①。在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交流中的概念引进或再造，早已不是王国维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可以比照的了。然而，虽然“犹不得不造新名”已属常态，但是以“新名”取代“旧名”却需要斟酌。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对“本土知识”的眷恋，固然反映了对“我是谁”的重新寻觅、伸张甚至构建的保守，但是又何尝不是力图将“本土知识”推向世界的自尊、自信？

在一个承认甚至逐步崇尚文化多样性的时代，学术研究的视角也呈多样化的散射，全球化的进程给学人更加多样的选择。一系列新的术语、概念正在纷至沓来，为学人提供了新视野、新理念甚至可以标新立异加以发挥的新观点。或许它们的产生符合发达的、后现代的西方社会时代特征，甚至它们也正在被谋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用来证明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志。但是，作为中国学者的首要学术责任是立足于国情实际的科学研究，而不是对西

^① 转引自：【美】麦克洛斯基等：《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83页。

方话语的“翻译”或“西式中文”的论说甚至削足适履的套用。“西来之说”的“本土化”固然重要，因为它体现了吸收与借鉴的必然要求；而“本土之说”的国际化又何尝不是这个过程的题中之意？我想这应该是译介的意义。

中国学界译介外国学术著作将会是一个长久持续的学术工作，这是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交流沟通的重要桥梁，也是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也许有一天，中国的学术著作，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会被外国学术界所译介，虽然这一天为时尚远。但是，译介国外学术著作能够为这一天更早的到来创造条件则毋庸置疑。因此，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需要指出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时逢2009年第16届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大会在中国举办，它对国内学术界更多的了解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使国外学者认识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开放和发展的取向，无疑也大有助益。为此，我们感谢诸位译者辛勤的劳动，也感谢出版社为推出这套丛书做出的努力。同时，也期待着学界同仁、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指正。

郝时远

2008年11月12日于北京

序 言

在一盏柔和的灯光下，
小孩子手指着地图陶醉于遐想之旅；
在一片古老的海域上，
大海盗搜寻着水面憧憬于血腥之行。

——巴勃罗·加西亚·巴埃纳

“地理可以规划但不可安排”，皮尔·比拉尔断然地说。从我读到这句话时起，我就对它的丰富内含深信不疑。我从未放弃过这个劝告而受益匪浅。在谈及比拉尔的一篇地理学文章时，恩里克·卢斯说，即使希特勒糟蹋了政治地理学，但是政治地理学还继续存在着。胡安·诺格从地理学的这些角度但又是灵活的角度，经反复思考写下了这本书。

地理经常像镜子游戏一样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就好像是我们走进商店试衣间的镜子一样。形象是同一个，但是源自这个形象的轮廓、大小，甚至连五官都变得不同了。这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的东西也会呈现出不同来。诗人贝雷·希姆弗雷曾经说过，诗歌是镜子游戏。由此也可以说，地理同样也是镜子游戏。让我们先从第一个游戏开始。

如果我们看一下巴斯克人的情况，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北部以前和现在都受到广漠无边的兰德斯（Landas）海滨沼泽地的限制。这种情况长期没有变化。像比利牛斯山这样一个“地理地

貌”，一直被视为是一种持续的结构。就是在最近，比利牛斯山也被认为是一个庞然大物，是一条将伊巴拉德（Iparralde）地区与南部分开的巨大边界。根据一个人民形成的时间来看，或根据一个北方国家对一个南方国家的军事行动把巴斯克人民分裂的时间来看，兰德斯海滨沼泽地和比利牛斯山这两个地理事实，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不同作用。

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加泰罗尼亚人。拉丁语的特殊方言止于萨尔塞斯（Salses）以上的地方，加泰罗尼亚地区也有一些大片海滨沼泽地与相应的人口空白区为界限。但是，法、西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以赤裸裸的军事存在把两国边界确定在比利牛斯山。如果我们从蒙特贝伊尔（Montepellier）向琼格拉（Jonquera）或从波尔多向伊罗（Irún）走一趟，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情况极为相似，甚至连自然景观都没有什么不同。这种相似，令那些善于细心观察的人也感到吃惊。

另一个游戏是：奥利文萨（Olivencia）在政治上离开葡萄牙而归属埃斯特雷马图拉和西班牙，这还不到200年。这是战争冲突的一个战利品和戈多伊（Godoy，1767—1851，曾任西班牙王国首相——译注）的骄傲。现在，那里还残留着教堂唱诗班的风格、某些葡萄牙的腔调以及在中学里由马拉贝尔引入的葡萄牙语教学。为什么在西班牙这一边没有其他同样的市镇呢？答案好像只能是地理的：奥利文萨是瓜迪亚纳河这一边唯一的市镇。一座被自愿拆除将近200年的桥梁证明，不准跨越的瓜迪亚纳河体现了人类的粗暴行为。一块界标令人瞩目。相反，我们却看到有几头母牛在嘲笑地试探着过河，这条河在这些动物眼里却不是什么边界。

胡安·诺格的这本书，启发我们从地理和其他因素的结合上来思考民族主义。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往往是就地理说地理，就民族形成说民族形成，就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说冲突。我们可以

证明，地理的具体作用是变化的，它可以说明点什么。这类例证是很多的。讲加泰罗尼亚语的阿拉贡人就是一个现实例证。他们讲加泰罗尼亚语是因为他们同讲加泰罗尼亚语的加泰罗尼亚人有着人口延续性，而他们的左边马比斯蒂加（mapística）则是空白区。于是，我设问：他们为什么是阿拉贡人和愿意做阿拉贡人呢？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从中世纪以来，他们就拥有做阿拉贡人的权利。这一点我懂；但我不懂的是：使阿拉贡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拥有法律上的领土意识（territorialidad）的理由是什么。地理学可以解释语言，但不能解释权利。或许，是我自己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最近几年，我花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国外或国际奥地利主义流亡者的思想。他们之中有些人定居在巴塞罗那，但同时又与维也纳保持着关系。鉴于在1734年由奥地利家族完全替代波旁家族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些人曾经提出重新划分西班牙的想法。但是，由他们想象西班牙该如何划分也是不可能的，尽管由于那个世纪列强之间的协议使其他想象变成了现实。这些人想象的西班牙应分成如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把加利西亚与葡萄牙合并。第二部分是西班牙的中部，从蒙塔纳到安达卢西亚，再加上西印度（殖民地）。第三部分则是阿拉贡王国和那些“特殊地区”的联合体。所谓特殊地区，是指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巴斯克地区和加泰罗尼亚地区。从表面看来，这种分法是以自然地理为界的，虽然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语言是统一的标准，而在第三部分中则是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非中央集权传统。为了保证这三部分的运转，可能还要强调一点，即第一部分由英国监督，第二部分由法国监督，第三部分由奥地利监督。胡安·诺格提到，黎塞留（Richelieu）也曾画过与此相似的地图。

当我站在地图前，从历史的角度讲述这个想象中的西班牙

时，我在有些听众的脸上看到了某种热情。何塞·阿吉雷·兹塞纳加送给我一幅分割了的西班牙地图，这幅地图是100多年前由一位地方行政专家画的。他在地图上画了四个西班牙，而“西班牙殖民地”实际上已经完全消失了。相反，由于1978年西班牙宪法第一条补充规定的原因，“特殊西班牙”则得以继续存在。“一致的或纯宪政的西班牙”，包括卡斯蒂亚和莱昂王室的“34个省”。而第四个西班牙，则是“并入的或同化的西班牙”，“它包括阿拉贡王室的11个省，它们在纳税和一些民法上还有些不同”。

地理划分是历史—政治的划分，而地图则无先例可循。弗朗西斯科·豪尔赫·托雷斯·维也加斯撰写了《历史—科学地图，即西班牙各阶段的西班牙地图》一书，该书有800多页，包括25幅插图和293个矿泉分布图。该书在1852年出了第一版，1857年出了第二版。该书有许多长篇论证性解释，这要根据作者在第3页上的一句话来理解：“没有地理的历史，是一幢没有地基的建筑。”托雷斯·维也加斯承认，自己受到孟德斯鸠的影响，并提出了气候对人类和人民具有重要性的理论，这一理论现在比几十年前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

本书讲述的地理镜子游戏，如果加以总结，可以说包括了所有情况，就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笔下的拥有千条小径的花园，让我们流连忘返。在无数的可能性中，我想指出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因素。例如就有那么一个民族，在达到世界文学顶点之后，即在行吟诗人创作出罗马语方言诗歌后，却在法国的软硬兼施下解体了。内部缺乏抵抗力，可以归咎于没有一个强大的首都城市来统领其他城市的体制。如果西西里西·贝利塞的这个论点有些解释力，那么城市地理早就该出现了。当我漫步在布尔德奥斯、波城、富瓦、托罗萨、卡尔卡松、蒙彼利埃和马赛等城市里时总是不解，并自问：这个失败的民族怎么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呢？相反，关于它的书籍，在这些城市的各家书店到处可见。

现在，让我们说说本书多次谈到的问题，即“埃塔”（ETA，西班牙分离主义组织——译者注）成员的地理观念。他们认为，巴斯克领土不能划分，巴斯克就是巴斯克；如果有谁对此提出异议，则会使该组织恼怒万分。该组织不承认巴斯克出现过领土划分，只承认巴斯克人的散居状态；巴斯克人的居民点虽没有扩大，但它们持续存在。像毕尔巴鄂这样的城市化地方，它扩张了，以致于后来成了那些“高山地区”各乡镇的中心。这些“高山地区”的乡镇有零星的工业，绝大部分是巴斯克人，它们是一些在不久前消失的农业城镇。最近，埃塔的暴力活动特别不一定是谋杀的街头暴力，开始转向了郊区，并伴随着青年人的罢工和其他情况的发生。在圣·塞巴斯蒂安市，则是另一种情况，那里的大部分区域由主体社会统治，但也有一些“民族”区域。如果说这些区域虽未凝聚成一个“民族”（*nación*），但要越过它则是困难的。在“好牧师”教堂后面的“天主教国王”街区，人们的衣着是平静的红黄色。相反，如果穿戴“老式”衣服，或在伊阿索广场，紧张气氛乃至严重局面就可能发生。如同任何事情一样，城市“民族”地理也有它到来的一天。

胡安·诺格编列的完整书目，也令我感叹。这个书目少有遗漏，甚至没有遗漏。虽然这种做法可能已经过时，但我们这些受到反“时髦伦理”教育的人，现在仍在读伊斯瓦·比勃在1944年出版的匈牙利文巨著《东欧小国家的贫穷》。这本书虽然最近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虽然是通过间接渠道，但它的名气当时就超越了匈牙利的国界。只要看一看它的两章题目，就足以体会出它的分量。这两章题目是：一章为“中、东欧领土规则的破灭及语言民族主义的形成”，另一章为“领土纠纷的悲剧”。中、东欧民族关系的紧张，是导致领土规则破灭的主要原因。南斯拉夫的战时边界经历过14次变化，可充分证明这一点。比勃向我们解

释道，民族感情不仅是一个人类群体（grupo humano）内部的纽带，而且它还可以使一定的群体与某些地方、神圣城市可引起历史记忆的地区联系起来。在那些与异己的多数民族住在一起并讲某个邻居语言的少数民族中，建立强烈的或过分的民族感情的表现，现在变得非常突出。当语言民族主义产生和领土规则被打破时，这些“复活”的民族同他们的邻居之间就产生了边界区分，这是“产生无数战争和灾难的根源，它导致存在模糊边界的人民之间关系恶化；中、东欧民族政治史的主要根源，就在这里”。胡安·诺格的这本书，讲的也是鲜血。

埃内斯特·卢奇

巴塞罗那大学教授

前 言

毋庸置疑，民族主义（nacionalismo）是一个敏感和复杂的问题，或者它至少是一个涉足其中似有如履薄冰感觉的问题。它是一个具有不同内涵且对它的解释又常常是对立的问题。虽然民族主义的意义深远，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民族主义一直是一个令人难以下笔的棘手题目。所以，包括人文地理（geografía humana）在内的社会科学，很少研究它。要把它从天天经历到的激情中剔除出去是不容易的；要把它放在书桌上平静地解析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民族主义是一种鲜活的、充沛的、变化的和自相矛盾的现象。虽然做起来不容易，却是有可能做的。至少，这是我写下这几页的初衷。

不过，本书并不追求分析民族主义的全部现象和深入地研究它的各个因素，仅仅是对民族主义现象提出一种到目前为止还少有关关注的不同见解。我是指民族主义的领土向度（dimensión territorial）。正如我们将要在下面看到的，在关注民族主义的性质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是有连贯性的，虽然并不因此而没有片面性。但在这些理论中，领土向度很少被涉及，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它甚至被忽视了。与此相反，本书的出发点就是，各种民族主义的领土向度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把它界定为是一种领土意识形态（ideología territorial），一种深深扎根于领土形象和领土参照物（imágenes y referencias territoriales）中的意识形态。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下列事实：由于各种原因，虽然我在题目上使用的“民族主义”是单数，实际上我是指“各种民族主义”

而不仅仅是指“一种民族主义”。脱离了社会、空间和时间的条件，抽象地谈论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是很困难的。由于本书的前言性质，我不可能深入到所举例子的历史、社会和空间根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如下事实：民族主义不只是一种，而是有几种。在历史的进程中和各自的地理背景下，各种民族主义的政治作用是变化不定的。

领土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很敏感的因素，常常比语言或文化更加敏感。或是因为想到各种激愤的民族主义借用“领土”问题来为政治行为甚至是非正义的军事行为作辩解，或是因为害怕被指控为宿命论者（determinista），或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各种民族主义的思想家们总是小心翼翼地谈论领土这个因素。不管怎样，在民族主义的论述中，人们或明或暗地经常使用与“领土”因素有关的形象、比喻、表述、暗示和参照。这些参照是什么？这些形象是怎样的？它们是如何传播开的？总之，民族主义现象的领土构成因素是什么？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把民族主义看做是领土意识形态？这些就是促成我写这本书的几个疑问。

这样，我们就要谈谈各种民族主义是如何利用领土来促进甚至创造民族意识形态的，尽管我们也要顺便提到我们称之为领土认同（identidad territorial）感情的东西。虽然经常有这位或那位分析家把这种认同感情和民族主义混淆了，但二者明显不是同一回事；由此，领土认同感情与各自的领土向度也不是一回事。这里，我们特别是指民族主义诉求的领土向度。我们希望将来有哪一本书，能深入地探讨领土意识、领土认同感情、归属于一个地方的意识（确切地说，是归属于更多地方和各级地方的意识）。不是民族主义创造了这些感情；这些感情本来就存在，它们是人类固有的感情，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感情；民族主义只是挖掘了它们，利用了它们，操纵了它们。

考虑民族主义现象的领土向度，并不是要为我们提供解释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真正和最终的理论。如果我们这样想，就犯了胆大妄为和自负的错误。我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试图找到新的和更多的因素来理解民族主义的动力和功能。为了展示领土向度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我们将提到不同地理区域和历史转折时期的例子，当然特别强调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各种民族主义，尤其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主义激昂的时代。全世界都是这样，有些是悲剧，另一些则是希望。民族主义在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不同的国家中都存在，如前南斯拉夫、前苏联、加拿大、西班牙，以及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所以，现在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仅仅是在几年前，有人认为——我们也认为——全球文化和经济一体化会消灭民族差别，社会冲突（“阶级冲突”是当时的说法）会取代领土冲突。但是这个预见没有实现。正好与此相反，今天我们有点惶惑地看到民族主义的真正爆发及史无前例的领土冲突。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大部分政治军事冲突，都有民族主义在作祟。但遗憾的是，这次在世界范围内新爆发的民族主义，并没有使民族主义理论家们重新严肃地审视民族主义概念，相反，他们按照最纯正的黑格尔传统，把民族主义理解为是一种自治和独立力量，是这种力量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再生。

读者手里的这本书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分析民族主义的概念，它的理论，它的不同意义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第二部分，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民族主义。这部分试图澄清政治地理学对我们讨论的问题有何用处或可能有的用处。政治地理学乃是当代地理学中最具活力的学科。第三部分的篇幅不长，是第四部分的铺垫，它把民族主义现象放到以地方与全球紧张的辩证关系为特点的世界上来考察。第四部分，具体研究民族主义思想的领土向度，以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历史背景的各种民族主义为